

毛澤東思想論集

——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

王文卿 羅 炯 主編

武漢出版社



罗 炯
王文卿

主編

毛澤東思想論集

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

武漢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毛泽东思想论集

王文卿 罗 炯 主 编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盟华科技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 10.40 印张 字数 27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6.60 元

ISBN7—5430—1060—7/D·94

前 言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几经曲折，发生了“天渊翻覆”的历史巨变。这些变化，是和毛泽东这个光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形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党的建设等方面，毛泽东同志都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为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认真探讨和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和挫折的经验教训，借鉴其它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历

史和现实的经验一再表明，坚持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同志晚年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从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是远远大于他的过失的。在纪念这位伟人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毛泽东思想论集》，奉上一瓣心香，表达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深切怀念。

这本论集，共选辑了28篇论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不同方面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多视角的探讨和研究，在发掘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层面方面，做一点工作。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迫，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为了使本书能及时出版，武汉出版社的领导和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领导给予了很大的方便和支持。武汉出版社总编办公室主任王业勤同志为本书作责任编辑，提供了许多具体帮助。在此一并致以忱挚的谢意。

编者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王文卿(1)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	董立仁(19)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 论断的探析	徐善广(37)
毛泽东与中国特色	居继清(46)
毛泽东与《共产党宣言》	郭金林(58)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学说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吴海晶(69)
对毛泽东“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 线”的再认识	谢 斌(80)
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理论的杰出贡献	田子渝 雷 宇(9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及方法论	袁斌昌(97)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宗旨	朱小梅(112)
对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道路理论的再认识	吕志刚(119)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梁玉祥(129)
试论毛泽东关于开放的原则	梅 倩(138)
论毛泽东的技术引进思想	肖 德(146)
毛泽东关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	

2 目录

的思想初探.....	张建勤(160)
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道路.....	刘誓保(170)
毛泽东与农业是基础.....	李卫(181)
解放思想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郭大俊(189)
毛泽东与邓小平生产力观之比较.....	江志贵(204)
理想的革命功利主义:毛泽东价值观评析.....	江畅(215)
深邃的哲学思想,伟大的历史创举.....	潘定(231)
毛泽东的道德观探析.....	李太平(239)
试论中华易学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法	
思想的影响.....	陈道德 陈正芸(253)
毛泽东诗词与中华《易》文化.....	罗炽(266)
毛泽东的形象思维.....	陈波 许多奇(280)
试论毛泽东的会议观.....	王浩 朱厚伦(289)
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	
及其现实意义.....	王春侠(303)
试论毛泽东反腐败的思想与实践.....	刘钟新(311)

王文卿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① 这里向我们揭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

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彻底胜利的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中，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其间几经曲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再加上党自身的建设，他把它们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第793页。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在旧中国这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上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遇到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并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始终，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二十二年中，围绕这两个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和分歧。

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下成立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一开始就遵循“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①的原则，以后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重申这条原则。一九二八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的纲领强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各国工人紧密地团结为一支不分国家、不分民族、文化、语言、种族、性别、职业的无产阶级国际大军”^②，共产国际是这支“大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它的“总参谋部”，其历史使命是制订出能规定并协调无产阶级世界大军的各国“支队”的行動的全部战略，并付诸实施。为了使共产国际的战略、策略能在中国贯彻实施，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以前，共产国际不断派出具有很大权威的代表来中国，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具体指挥。中共六大以后，根据布哈林的建议，共产国际不再派遣全权代表来中国，而是中共派代表团常驻莫斯科，使共产国际能了解中国情况，也使共产国际的战略、策略能在中国执行。

在共产国际存在的这段时间里，尤其是它存在的初期，给予了中国革命不少帮助和指导，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但是，

① 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 1919—1943》，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卷，第5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472、473页。

首先，由于共产国际的中心远离中国，它的政策和策略很难做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尽管它派有全权代表常驻中国，有的也作过某些调查，但作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情况不可能不受到很大局限，尤其象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矛盾十分复杂，要真正了解它的实际，实在是太难了；其次，共产国际的中心设在莫斯科，它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来自苏联，他们很容易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再次，共产国际把苏联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堡垒”，规定世界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是要保卫这个“革命堡垒”。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从属于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它的一切政策和策略必须适应苏联的需要，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服务，有时不惜牺牲中国革命利益。由于这些原因，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实际。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之所以犯错误时说，就是因为他们跟着外国人跑，而不能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领导中国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在于他能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相结合，十分策略地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对共产国际错误的抵制，就不可能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

共产国际在其开始阶段，对东方民族殖民地的革命政策是比较正确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具有很大的历史功绩。但后来过分强调同国民党结成联盟，在统一战线和农民运动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七日，共产国际举行了第二

次代表大会，列宁为这次代表大会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指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并指出要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①会上发生了印度代表罗易同列宁的争论，罗易不同意列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估计，否认民族资产阶级有重要历史作用。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纲，也通过了罗易起草的提纲，后经列宁同意，将罗易提纲作为《补充提纲》附在列宁提纲后面。此次大会成立了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会后逐渐形成了苏联援助下国共合作的战略思想。

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委派马林作为代表来到中国，贯彻这次大会决议。一九二一年七月，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即全力从事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的工作。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马林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一九二二年九月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在共产党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马林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则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叫党。同年七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基本思想，保留了共产党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支持马林主张的决议。同年八月马林和苏俄特使越飞一道返回中国。马林参加了在杭州中共西湖会议，通过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越飞宣言。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共产党员、青年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75页。

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了共产国际关于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应该看到，在实现苏联援助下国共合作战略的过程中，共产国际违背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提纲初稿》中关于无产阶级要绝对保持“运动的独立性”和“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特别是一九二六年以后，共产国际，为了保持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不惜作出任何让步，结果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早在 一九二二年，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中，就把国民党说成是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工人“各阶级联盟”，而说中国共产党“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拉狄克继续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说在“中国议事日程上”没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此次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提纲》和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都包含有上述错误思想。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孙中山和越飞的上海宣言称：“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应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体会议，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称国民党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的革命联盟”，广东政府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先锋”和“未来民主结构的典范”。坚持同国民党建立紧密的联盟，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体会议后不久，一九二六年三月和四月，接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此时，摆在共产国际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抑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作用；另一种是支持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同蒋介石分裂。共产国际选择了前一种。尤其是“整理党务案”，是事

先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同意的。“整理党务案”通过以后，陈独秀曾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但遭到共产国际反对。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以后，共产国际曾支持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但当农民运动侵犯到国民党军官利益，危及到共产国际、苏联同蒋介石的联盟时，就马上退却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共产国际给上海中共中央来电：指出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要加强土地运动。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人来华调查，结论是中国目前不应进行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年二月，蒋介石派人捣毁赣州总工会，屠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共产国际、苏联同蒋介石的联盟濒于破裂，但共产国际、苏联竭力制造舆论，说蒋介石不会叛变，只会服从国民党指挥。同年三月十六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宣传蒋介石不会叛变。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共产国际怕上海工人纠察队会妨碍同蒋介石的联合，指示中国共产党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埋藏起来。四月五日，陈独秀遵照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同汪精卫发表了宣言，粉饰太平，麻痹人民，对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客观上起了帮助的作用。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结束了他与共产国际、苏联的联盟。但共产国际、苏联没有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没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而又将注意力集中于武汉，竭力强调与武汉国民党联盟。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继续把武汉政府当作“革命中心”。五月二十一日发生“马日事变”，武汉政府倒向反革命一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发来指示，提出要“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部队”，但又要继续坚持同汪精卫建立联盟，以致汪精卫得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内容，发动了“七一五”叛变。至此，共产国际关于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宣告终结，使中国革命

陷于绝境。

造成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条件来看，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缺乏革命经验，大批革命骨干还未造就出来；从客观条件来看，敌人力量强大，革命力量弱小。但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指导政策上的错误也是中国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共产国际、苏联却把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全部推给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总书记陈独秀身上。布哈林在一九二八年夏季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失败，“错误不在于基本的策略方针，而在于中国采取的政治行动和实际执行的具体路线”。的确，陈独秀无论在北伐开始前的中山舰事件，还是北伐开始后的农民问题上，以及在紧急时期挽救革命时局的斗争中，都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对于这些错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的这些错误都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有密切关系。而且陈独秀在有的问题上提出过不同于共产国际、苏联的观点，但最后他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共产国际不同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他是按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世界革命党，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和纪律十分严明的国际革命组织。它规定：“为使革命工作和革命活动能够协调并得到适当的指导起见，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有国际的阶级纪律。”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一切决定“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不仅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必须坚决执行，就是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对各国支部也具有约束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要求国际所属的各党开除违反国际纪律的部分成员或个别成员；它还有权把违反代表大会决议的党开除出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消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关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作出各该中央机关必须遵守的决议。”

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看到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在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右

倾机会主义错误。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同志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①毛泽东同志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指出买办资产阶级是我们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动摇不定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为了回答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种种责难，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进行了三十二天的考察，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②针对所谓“糟得很”的议论，毛泽东同志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有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立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③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第12—13页、15—16页。

三

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开始转变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有助于中共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随着共产国际政策日益“左”倾，在中共党内又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文章：《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垮台了”。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作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决议》，号召“迅速地改变口号”，“断然打破已经……变为斗争桎梏的联盟”。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出席了会议，会议发表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从此，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单独领导中国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政策。八月九日，共产国际根据七月二十八日斯大林发表的《时事简评》一文，说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着手建立苏维埃的决议。在十一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明那兹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说中国革命是高潮而不是低落，工农革命有汇合成总暴动的趋势。会议制定了广州起义的计划。广州起义很快就失败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到九月一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把共产国际建立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时期。这个时期一九二一年达到顶峰，……以一九二三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和局部稳定，

资本主义经济‘复兴’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攻势加强和扩大时期，是无产阶级大军为几次严重失败所削弱后，继续进行自卫斗争的时期”。一九二八以后，进入了第三时期。这个时期，一切帝国主义矛盾都越发尖锐起来。“资本主义的稳定日益动摇”，“资本主义总危机必然走向极端恶化的地步。”“第三时期”理论，实质上就是要无产阶级把整个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当前的现实的革命目标。

“第三时期”理论提出后，很快影响到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三封信，特别是十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来信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紧急口号”。因为一九二九年十月爆发了中东路战争，张学良要推翻一九二四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收回中东路，这一行动有日本作后盾。苏联感到有战争的危险，在东方需要支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中国出现武装暴动和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实现“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根据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李立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相配合的中心城市武装暴动计划，导致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李立三发动的工人武装暴动和红军配合攻打大城市的军事行动，很快就遭到彻底失败，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其严重损失。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发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